

无文探隐

——试破文化之谜

金克木◎著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杨晓敏

封面设计 露水

无文探隐

——试破文化之谜

金克木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89000

印数 1—2200

ISBN 7-5426-0523-2/G·83

定价: 3.70 元

目 录

冰冷的是火(前记).....	1
试破文化之谜.....	12
新诗·旧俗.....	31
轨内·轨外.....	50
无文的文化.....	74
信息场.....	93
显文化·隐文化.....	118
治“序”·乱“序”.....	136
从孔夫子到孔乙己.....	154

冰冷的是火

这里的八篇文章^[1]，以《试破文化之谜》起，以《从孔夫子到孔乙己》结，可以说是《文化的解说》^[2]的续篇。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陆续出版了十几本书，完全在意料之外。以前我发表著译最多的时期是30年代，留下的书只有一本诗集《蝙蝠集》和一本翻译的《通俗天文学》。为什么到了晚年忽然多产？除了少数翻译和旧作诗文及《梵语文学史》外，大部分是这十年新写的。我为什么要写？

我在信和疑之间翻腾，在热和冷之间动荡过了七十多年。这恐怕是我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不得不将思想化为文字的内在原因。像蚕吐丝作茧使自己僵化并将自己埋葬一样，我也是倾吐衷曲使自己僵冷。不过我

[1] 这八篇文章曾在1991年《读书》上发表，因限于篇幅，发表时作了删节。

[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和蚕不同。它能由蛹再生为短命的蛾子，我只能留下破烂的废纸。

大约过了十岁不久，我忽然朦朦胧胧开始怀疑自己的出生。这疑心越来越重，终于觉得自己的出生是给别人，首先是生我的母亲，带来痛苦，将来也会给自己和更多的别人带来不幸。我的生命是一场灾难。从周围的小朋友和大人，从念书和游戏，从家庭和学校，我只感到疑心，没有信心。

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我忽然生出了信心。一种虔诚的宗教性质的信仰抓住了我的心。我不顾一切投身于一种活动。没有丝毫疑虑。没有一点顾忌。不但也不想什么饥饱生死，简直是以为自己的生命牺牲是一种愉快，有一种洪流中泡沫破碎的幸福。无论身心我都还是小孩子，可是自己觉得已经成为大人，能担当任何事体，能肩负任何危难。这是我经过的第一次信的高潮。

然而，不怀疑的信仰中仍然不知不觉积累着迫使发问的点点滴滴的疑，只是自己不知道。十八岁快满的时候，几位二十多岁的人，进过上海大学、中山大学、黄埔军校、武汉干部学校的人，在乡间小学和我共处一年。他们毫不客气地点出我的痴呆的狂妄和不自知的自负。他们说的话不多。他们的人很快便让我感觉到

自己的矮小。于是我听从他们的指点，冒冒然避开中原的战火，从上海绕道，经过天津来到当时的北平，原来的和现在的北京。

冬天的冰雪，春天的风沙，夏天的烈日骤雨，在沿街铺面的酒缸旁遇见的形形色色不平凡人物，例如倒霉的“大帅”的随从，这些北平的所见所闻，不住地敲打我的可能还带着肺病的身体和生来有疑的天性。还不满二十岁，自觉已经老了。仿佛我是我没见过的已故的父亲的继续存在，是由前清光绪年间，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直活下来的。身弱，心老，生活贫困又单调无味。无论中国书、外国书、旧书、新书，都使我仅能感到一片迷茫，连疑也无从疑起。

1931年“九·一八”使全国翻腾。北平首当其冲，无比热闹。我夹在中间增长了说不清的见闻。对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青年，佩服而且羡慕。可是我的心仍然，甚至于更加，像是晚清的人了。

到北平后我写了不少习作。旧诗、新诗、散文、小说(小小说)、戏剧(小品)，什么都练习一番。我在北平认识的第一位外乡朋友王克非把我写了许多毛笔字的几个本子全拿去了。不知他挑选些什么，用些什么名字，塞进他编的一个“报屁股”(副刊)填补空白。他只有编辑费，报馆不发稿费，所以只好拿我的东西充数。我

既没有不安，也不感到得意，只觉得好笑，怀疑这样的无聊文字也会有人看。不料到60年代后期，居然有人想去在里面查找什么罪证，真是当初万万想不到的。

终于在满二十岁以后不久，我第一次发表了新诗。第一首题为《秋思》。刊登出来以后，我怀疑除了《现代》杂志的编辑施蛰存和他的朋友戴望舒以外有谁会赏识。

梧桐一叶落，
海上土色的云升起了。
遂有鲛人的泪珠
不息地滚下：千滴，万滴。

何时再见暖暖的烟雾呢？
芦荻已哀哀呜咽。
惟有寒潭里依然安息着
冷冷的缺月。

我当时想，这前半是不是旧诗？“梧桐一叶落，海上土云起。鲛人珠泪流，簌簌不可止。”但“土色的云”不能是旧词。后半改不成旧诗，可是用了旧法，双声叠韵，平仄配搭，行款字数。这是不新不旧，新而又旧，旧

而又新的诗吧？友人一怂恿，我便寄出去投稿了，还不止这一首。

这诗，不像是二十岁青年的心声，也不像八十岁老人的口气，但确实是从那时的我的胸中发出来的。不论诗好诗坏，如何对此“文心”作出解说？这里的八篇“探隐”之作实际也是对我从幼年就有的疑问试作似不相干的回答，也可以说是从自己的这首小诗破起，不过文中说的是别人的诗。

40年代平平度过。世界的战火弥漫中，我在海外的苦难的土地上学习和观察，开了不小的眼界。种种的奇特尝试使我往往仿佛处于不信不疑亦信亦疑的精神境界，能在梵呗钟声佛光塔影中冥想度日。我偶然认识的有奇特经历的印度师傅桥赏弥老人对我说过一句话：有一点信仰好。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没进过学校读书，在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当过教授，六十多岁在佛教圣地鹿野苑息影而与我相识，教我用不寻常的方式攻不寻常的艰难古籍。后来他在印度独立声中绝食去世。他并不要求我相信他所相信的，只是告诉我，信比疑好。

果然，一进入50年代，我同时进入了第二个信的高潮。我明白了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出生起就一切都错，所以对当前一切是不疑坚信，将问号和“为什

么”从头脑中驱逐出去。

一个波涛又一个波涛，我仗着信的舢板浮沉了十几年，终于几乎淹没，忽然成为非驴非马有罪无名的一种可疑动物。我仍然保持着坚信不疑而认自己永远错误的态度安然无恙随众浮游。信确实比疑好。无论如何遭践踏，始终稳如路上之石。邻居刚会说话的两岁娃娃对我大喝一声“低头”，我欣然照办，私心以为能使他高兴自己也高兴。

60年代末，70年代初，整整两年我有幸逢上了极为难得的经历。用无限的紧张压碎有限的思维。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替代微弱的脑力运转。通宵夜战“五·一六”。划破午夜长空的紧急集合号。急风暴雨中和天上地下的泥泞搏斗。冰天雪地里修堤露管埋锅造饭急行军。我在打谷场上曾一连二十多小时不眠不休，最后才有一位工人看出来，说，不要等替工了，回去睡觉吧。夜间大雷雨，我一个人落后，湿淋淋跌跌撞撞暗中摸索回去，居然没有被狂风吹倒。最后进仓库宿舍时人人视而不见，如逢鬼影。真是稀罕的感受：生如死，有若无。我沉默着度过了一生中最少说话的两年，成为地地道道的无人过问的废品，不囚不定罪的准犯人，居然无病无灾。直到开始感到心肺胃全不正常四肢无力时，才奉命离开鄱阳湖畔回北京。这正是我跨入虚岁花甲诞辰

的前夕。

我原是一个样样不会事事不懂因而可以到处填补空白的“听用”之流，由此有幸得到种种劳动经历。单就农田说，我从选种育秧插秧挠秧施肥收割一直到晒谷收场全套从头到尾都动手动脚干过。在烈日曝晒的谷场上用光脚走来走去踢翻滚烫的稻谷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谷子干到什么样可以入仓？我也学会了用牙一咬便知干燥程度。开头只怕插下秧去不活，总想多望两眼，总是慢得落到最后致受讥笑。看到收来稻谷不知一万斤粮食有多大一堆。到自己也抬起一包包稻谷，又记下人家秤上的斤数时，我竟也能一眼望去略估数量。在谷仓中学会用长温度计测温，凭眼看手摸便能大致分别“珍珠矮”等许多不同品种。在拾穗时见到像芦荻一样的奇异的杂种稻和根上再生的新谷。此外还有种种劳动风光，例如我赶外来偷谷的猪失败才知猪狡猾，月夜看场听蒙族老同事讲沦陷区旧事等等，数也数不尽。紧张加紧迫。还有“要准备打仗”的实战训练一次又一次。时刻会有的突击行动，夜战，午战，难关一道道，我也一一度过了。我仗的是信而不疑，心中无问号，精神果然能变物质。通宵夜战拾土后天亮时能连吃六个萝卜馅大包子，还能高歌正步加跑步回草棚军营不知疲倦。可以用当时口气说：这才是“干校”，这

才是“五七战士”。

70年代第二年(1971年)我回到北京。孩子们全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只有我和老伴在两间小屋的残余书堆中相会。我又学会了煮饭烙饼炒菜生炉子从机器井打水，直到试用三种方式炖小沙锅红烧肉。对于出了什么大事我不闻不问。尽管身体已大不如前，我还是深深怀念用体不用脑事事听从人不必自己想的无忧无虑的快乐，对于还要自己再用头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这时我差不多达到了忘记书本也不大识字的高级水平。什么拼音象形左行右行洋文中文统统陌生，对堆在屋里的残余书籍翻也不想翻。脱离了六十年的字纸生活而在百尺竿头更进入“无文”的最高境界是我向往的目标。

可惜好景不长。用烂泥糊苍天，用坠落求飞升，用肉掩盖灵，劳身而闲心，紧张而安稳，终究不能长久成为我的暮年好运。幸而也没有很大噩运。有一次会上(1972年)当众宣布我还是平常人以后，我终于能够安然以废品身份终老。然而无可奈何的是身体已衰而忘性还不足够。一生经历又在我的脑中翻腾起伏。信逐步退让。疑再占上风。这才是厄运。

何时再见暖暖的烟雾呢？

芦荻已哀哀呜咽。

为了排遣，为了忘记，我又拿起笔来。不再需要写检查交代汇报了，可是我要自己检查自己，要祛疑求信。于是又寻找古人、洋人、洋古人，以书对话。结果是写出了长长短短的一些独白。疑越来越多。信越来越少。一直疑到了几十年来，特别是二十几年来，热闹非凡的“文化”，写出了《文化的解说》，继续提出疑问。

有问无答，不能停止。为什么总是以感觉代思维由感想定行动呢？在疑和信的交替中，在“有文”和“无文”的交织中，我感到了一种“民俗心态”。信时个人和别人一样。疑时也是个人和别人类似。越是各个人自以为独立用尽全力，越是给许多别人增添力量，结果是比个人毫无自主完全听从别人时献的力量更大。波涛滚滚是由于每一水分子的推移，可以“无风三尺浪”。若所有水分子都等待风来才动，那会成为潮沼中的水。由风卷起狂涛，狂涛再也大不过风力。疑也罢，信也罢，其实是一回事，都跳不出民俗心态，即众人长期习惯的心理倾向。

这里的八篇文中，我试探索所想到的民俗心态，试图从有文的文化考察无文的文化，试用破谜的方式来看新诗、《论语》、《文选》，这些仿佛远离“无文”的文化

现象，也点到明显接近“无文”的《人间地狱》、《春明外史》以至《孔乙己》、《药》。我用普通语言讲平常事。用“场”、“序”也只是模糊概念，不是专科术语，不过是当作方便的符号以免啰嗦。

仅仅十几年以前人人经历过的事已经有了各种不同描绘和解说，各自声称合乎真实，那么，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事，仅凭有文的书本怎么能作出对民俗心态的解说？

稍微一想就知道，所有对“过去”的解说都出于“现在”，而且都引向“未来”。这三个指示时间的词是印度人用的词的古代直译吧？只是“现在”有点不同。他们用的是不停的“转”。我们用的是固定的“在”。这也就表示双方民俗心态的不同吧？由此可以看出，不论“解说”如何多变，变不出民俗心态以外。所以总可以从多变的符号“破”出不变的谜底。而且，大概不只是中国如此。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加勒比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到处都有波涛汹涌，也都不过是显示各自的水势罢了。这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冰雪凝冻的北极和南极的四季变化比终年阳光直射的赤道上的变化恐怕不会更小，也许更大吧？这是“自其变者而观之”。

既然处处有谜，就可以处处去试破。疑出于信。无

信何疑？疑与信不一不异。

我们的言语行动的指挥者不是高深玄妙的思维而是感想，习惯性的感想，由无数人长期积累的民俗心态。自觉是独自的想法仍旧是出于众人。自觉是无我的反而会自我显现。

若笼统问我现在是疑是信，是悲是喜，我说不出。十几年来自己以为在试破文化之谜，其实是处在谜中此刻我好像不能思考，只能感觉。信和疑之潮好像郭已成为过去。写完八篇废话，再也说不出什么了。也许是又有点明白了吧？明白了什么？

笑出的是眼泪。冰冷的是火。[1]

1990 年终

[1] 本文曾在《收获》1991 年第 3 期发表，其中略有删节。

试破文化之谜

客：你写的《文化的解说》使我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开头讲说一通符号学，后来不再提了。这是为什么？

主：所谓符号学应当是研究种种符号的。理论不止一种，应用更加繁多。这本小册子并不是符号学研究，不过讲到文化方面的一些符号的意义，由此引出一些对文化的看法，也就是一种解说。后面说的是一些考察的结果，涉及许多方面，当然不能一一提到文化符号。而且，符号学这个词在外国文中有专门涵义，在汉语中还没有通用的译名，又容易和“象征”理论混淆，还是不多用为好。本来这也只是一块招牌，一个符号。我写的不是商品，用不着处处贴商标。

客：另一个问题是：那小册子讲的主要是中外文化或说两种文化的对比、对撞或交流问题，是不是还没有说到全面？文化的全貌，特别是文化的变化，不仅有

内外的对撞，还有内部的矛盾对撞吧？单讲内外对撞未必能解说文化。

主：不错。所以说到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以至世界思潮，只是提出问题，作了一点解说，对于这些文化符号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并没有作多少讨论，当然谈不上全面。

客：那么，何妨继续讨论？还是照研究符号的基本思路走下去。从文化“符号”探索其“意义”。这当然不能算是符号学的研究，也不必以此标榜，免得有招牌无货。

主：这谈何容易。我自从小时候读到梁漱溟讲演罗常培笔记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后，一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在读书教书中，也就是在文化中，兜圈子，都不曾注意到这个笼统的“文化”本身。这以后，近十来年，才想到自己始终在这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圈子中间转，而从未问过究竟什么是“东方”，什么是“西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哲学”。这四个词都是中国汉字，可又都是现代才有新意义的从外国进来的新词，也不见得都有和外国原词一样的涵义。于是回头来检查几十年所学来的和对人讲过的都是些什么，又伸头探望一下70年代、80年代外国有了什么新花样或新问题。可是人已经到了风中残烛的晚年，勉强作了一点“文化的解说”的试探，再没有力量

向前走了。

客：得不到“新知”，就商量一下“旧学”也好。“文化”一语，照旧笼统说，不必深究。不妨先查查中外文化关系，看看是不是一定要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内部才能更多解说对外关系。

主：好，那就先提问题。不过不限于考察符号吧。

客：第一个问题就是，两种文化相遇是不是必定冲撞或汇合？为什么对外来的东西，有的学得起劲或者反对得拚命，有的不学，不闻不问，若无其事？

主：这是不是说，中国文化，主要是汉族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选择性，不是拿来就要？

客：这种选择性恐怕不仅是中国文化有。例如，中国的造纸和印刷术，近邻印度就置之不顾。中国唐代道家盛行，皇帝尊重姓李的本家老子。这时日本人学去儒和佛而不传道教。

主：有取有不取，有迎有拒，有合有不合，这在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关系上从古到今都一样。这只有从内部分析才能找出原因和条件而加以解说吧？

客：由此又引到第二个问题。有不学的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学的也常常拐弯子。日本学欧美开始是从中国学的。19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上海出版的译成汉文的欧洲书籍，日本人拿去翻印，翻